

【农史研究】

# 打井与政治

##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皖西北打井运动

葛玲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广东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章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皖西北地区的打井运动为中心,呈现了建国初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政治化倾向。通过对打井兴起过程以及打井技术与经济条件制约的分析,揭示了打井走向政治运动化的过程。水井的高报废率虽遭致基层对打井的质疑,但走上政治运动的打井并未在抱怨声中适可而止。在不断政治化的推进中,水井的高报废率也最终消解了这场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原本意义。

**关键词:**皖西北地区; 打井; 农田水利建设; 政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2)02-0089-07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为了更好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需要,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冬季,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sup>[1]567</sup>在此要求下,从当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决定事实上宣布了1957年下半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实际上已失去计划控制,开始进入‘大跃进时期’”<sup>[2]12</sup>。目前学界对决议引发的这场水利运动已有不少关注。<sup>①</sup>不过对决议出台前农田水利建设的情形,仍少有呈现。实际上,《决定》在总结此前的水利建设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地方在水利兴修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现象以及工程单一化问题,尤其对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打井,计划定得过死”提出了

批评。<sup>[1]568</sup>《决定》对打井的批评,表明大跃进前的农田水利建设虽没有此后的规模,但透过地方对打井的“过分强调”,仍可看出作为运动的水利建设实际上早已开启。

自新中国成立始,打井就被中央及地方视为旱灾防治的有效策略。而与“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运动受到的高度关注不同,打井因并未上升为一场全国性运动,故少人问津。<sup>②</sup>不过《决定》对打井的批评,说明“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早已有迹可循。因此对“大跃进”前地方打井运动的研究,可为我们从微观与实践层面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拟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皖西北地区的打井为中心,通过对其兴起过程、实践中的技术与经济制约以及最终效果的梳理,呈现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打井走向政治运动的过程,以期为

收稿日期:2011-09-22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基金项目(XRZZ2010011)

作者简介:葛玲,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政治与社会。

① 相关研究可见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王瑞芳:《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评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李安峰:《“大跃进”期间地方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作用——以昆明为例》,《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 关于打井问题的讨论可见农业部农村水利司:《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368页;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水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02页;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阜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20世纪50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整体反思抛砖引玉。

## 一、旱灾防治与皖西北打井的兴起

皖西北虽处淮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但旱灾亦时常威胁正常的农业生产,基本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sup>[3]39</sup>。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皖西北各县均遇不同程度旱灾。即便发生淮河大水的1950年,临泉、颍上等县亦逢夏旱,以致“黄豆难以播种,春种作物枯黄”<sup>[4]144</sup>。频发的旱灾,带给当地人的痛苦甚至大过水灾,所谓“排涝易,抗旱难。”<sup>①</sup>由此也形成了皖西北应对农业灾害的一个基本经验,即水旱并治。与大型洪涝灾害防治工程的实施一般需政府主导不同,旱灾应对可以在乡土层面上展开,尽管效果不甚理想,但亦未阻碍当地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旱灾。

在长期遭受干旱的农业地区,水井的抗旱作用颇受重视。<sup>[5]1567</sup>新中国成立前,皖西北地区水井多为人工开挖,一般是土井和砖井,井深较浅且出水量少。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畜饮水分流了水量,故水井抗旱的效果并不理想。截至1949年,整个安徽淮北地区仅有土井、半砖井1109眼,灌溉面积也只有2000多亩。<sup>[6]401</sup>临泉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仅在瓦店打过两个砖井,水井抗旱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sup>②</sup>但对临泉这样地表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农业区来说,打井抗旱确是个现实选择。建国初期的连续干旱也让政府意识到,打井抗旱应成为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

1950年的夏旱,使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打井抗旱的重要性。不过受资金与技术限制,此时仅以打土井为主。1951年,临泉向下分配打土井任务80994眼,1952年再分配土井任务77895眼。<sup>③</sup>临泉初期的打井抗旱,事实上也符合国家政策要求。1952年2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即力主各地发展水井灌溉。<sup>[7]</sup>同年,阜阳地区为指导各县打井活动的开展,也抽调基层干部30人,经过培训组成打井队赴各县传授技术。<sup>[4]310</sup>从分配的任务看,临泉初期的打土井规模不算太小,但实际上这些任务不仅多未完成,而且效果也不太好。1953年,县长赵荣秋在总结前两年的打井工作时即指出,“过去几年来行政命令挖了不少,收效不大。”<sup>④</sup>在行政命令下,打井往往成为一项政治工程,难以结合地方实际,自

然无法起到预想效果。

1953年,皖西北地区春旱严重,由于前几年所打土井抗旱效果不明显。为改变此状况,阜阳地区开始从河南聘请师傅传授砖井技术,当年即打砖井万余眼。<sup>[6]401</sup>1954年,地区水利局再次组织8名技术人员到山东济南、掖县学习建井技术,并从当地请回3名技术人员到阜阳指导打井。<sup>[4]310</sup>临泉也由于土井抗旱效果差,从1953年即开始收缩打土井规模,“今后只在砖井周围打起作用的土井,每个砖井带两眼土井,以便利用砖井上的马拉水车,发挥进一步的灌溉作用”<sup>⑤</sup>。即便经历了1953年的旱灾,临泉1954年的土井规模依然在缩小。在地区从外地引进砖井技术后,临泉也曾尝试打砖井。截至1954年12月,全县共有砖井27眼。<sup>⑥</sup>不过与地区在打砖井上的积极不同,临泉却认为打砖井的高额花费不适合当地实际。1953年赵荣秋呈递专署的报告指出,砖井“成本大(每眼连水车300万元,折杂粮5000斤——旧币,引者注),收益小(15市亩)。现在普遍打经济条件不能允许,打不起(等于20亩地的全年收入)。将来用不上(15亩一个砖井,既浪费劳力,又浪费土地,还不适宜机器耕作),所以不作一般号召,只在杨桥、邢塘、长官光怕旱不怕淹的土地等经济作物、改良棉区打。”<sup>⑦</sup>根据赵的分析,打砖井是得不偿失的,县里也据此作出了不普遍号召的决定。不过这一态度随着1955年地区在打井问题上的政策调整,随之发生了变化。

1955年阜阳地区再遭春旱,为了进一步发挥水井抗旱的作用,地委成立了专门的打井办公室,并向各县提出“全党动员,全民行动,在一年至两年内打砖井10万眼、土井10万眼”的要求,<sup>[6]401</sup>由此掀起了一场全区范围的打井运动。地区对打井工作的进一步强调,除了抗旱的考虑外,同时受到了1954年省委发起的稻改的影响。<sup>[8]</sup>在防旱与满足稻改用水需要的双重目标驱动下,打井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仅停留在提倡层面,而渐成为一项配合稻改的政治工程,留给基层的自主选择空间也慢慢消失。在这一背景下,临泉1953年即决定大规模

① 临泉县生产救灾指挥部. 临泉县农业“三改”座谈会初步总结报告. 临泉县档案馆藏档案,案卷号:142-1-9(以下略称临档:142-1-9),1954年4月12日。

② 宋思科. 临泉县各区已作抗旱水井统计表. 临档:69-1-7,1954年12月6日。

③ 赵荣秋. 临泉县农田水利工作的检查与今后意见. 临档:17-1-92,1953年1月1日。

压缩的打土井工程,以及被认定得不偿失的砖井工程,都只能重新上马。这一转向,尽管有违县委根据本地实际作出的经验判断,但基层声音只能湮没在日渐政治化的打井运动中。

## 二、技术与经济制约下的打井实践

1955年阜阳地委发起的打井运动,使临泉两年前提出的压缩打井规模决策就此作古。两年间,临泉的经济条件或会改善,但砖井“成本大、收益小”的状况应不会立时改观。只是在任务压力下,县委已无暇顾及技术匮乏与经费短缺的现实。

1953年和1954年连续派出人员学习打井技术,表明阜阳地区大规模打井的首要制约因素是技术人员缺乏,临泉也是如此。1954年前,临泉水利局甚至没有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直到1955年,才有了2名专业技术人员。<sup>①</sup>建国后,临泉第一眼砖井的开打,就是在干部指导下靠打井人员自己摸索完成的。结果由于多数干部缺乏基本的水利常识,以致所打之井不合标准。“干部缺乏水利常识,失去技术指导,因之挖沟打井大部不够标准,比降不大则小,不够要求。挖了沟影响了流量,开塘打井不够标准,也影响灌溉。甚至个别区的水利干部和建设干部连流量比降都不懂得。”<sup>②</sup>如此条件,显然无法实现大规模打井的要求。

对各县打井技术人员的短缺状况,地区是了然于胸的。在提出一至两年内打砖井10万眼的目标后,专署即在阜阳县新华农业社开办打井学习班,培养了30名打井技术人员,分赴各县指导打井。<sup>[4]310</sup>在地区技术人员帮助下,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打井任务,临泉同样开办了打井培训班。

1955年临泉打井技工培训班于2月15日开班,27日结束,历时13天,培训人员174名。174名受训人员中,社长116人、区干12人、技术员46人。从人员构成看,培训不像是技工培养,更像是针对负责人的打井扫盲。13天学习中,学员完成6眼井,其中全砖井1个,半砖井1个,竹井1个,荆条井2个,苇井1个。<sup>③</sup>如此安排,意在使参训人员能对各种井的基本知识都有所了解。据县委总结,十三天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培训,174人中打井技术全会、掌握较好的有105人,一般则有69人。尽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仍未完全掌握打井技术,但在任务压力下,县里已无耐心对他们作进一步培训,而是让174人马上由学员转成了师傅,承担起

向各区积极分子传授打井技术的重任。经过此轮转授,各区积极分子的打井技术应该不会好过他们的师傅。因此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培训效果看,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技术培训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打井技术人员的短缺。且随着打井任务的不断攀升,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相应增多。直至1956年,临泉还认为本县“技术力量不能适应普遍开展打井运动这一新的情况”<sup>④</sup>。

1956年临泉对打井技术人员匮乏的苦恼,一方面说明了此前的培训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也与1956年打井任务的急剧上升有关(1956年临泉新挖砖井18120眼,1955年仅为75眼)。为此,当年二月中旬,县里又开办了167人的打井训练班。与前一年相仿,培训结束后167人便迅速完成了由徒弟到师傅的身份转变。他们被分派到11个区组织了15个典试队,十天内就培养出打井技术骨干1760人,还通过各种会议使16000多人观摩了打井。

按照县委设想,直接参与培训的1760人自然成为新技术骨干,观摩的16000人也应能初步掌握技术。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年春临泉共打井18127眼,其中全砖井1357眼,半砖井12649眼,竹井2593眼,荆条井1035眼,苇井219眼,利楂井269眼,木井5眼。<sup>④</sup>从数量看,这样的成绩似乎说明了培训与观摩的良好效果。不过,数量只在完成任务上有意义,新井能否在抗旱时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井的质量。县委也承认,即便经过培训与观摩,仍有不少地方甚至连把井打在哪里都不清楚。“很多井的位置不适当,到处乱打,群众称为‘满天飞’。有的机械掌握200公尺远一眼井,把井打到坟旁、塘边、沟涯、溲地。使得或者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变成多余。”<sup>④</sup>在整个打井工序中,技术含量不算太高的位置确定已尚且如此,其他如深浅这些直接关乎质量的工序完成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县委的调查即表明,新打井多数不合格。按照要求井应打10公尺,水位7公尺,换算后就是21尺。不过1956年3月县委在城关等8个区45个乡镇发现,检

<sup>①</sup> 临泉县水利局. 现有水利工作人员增长情况整理表(1949—1955). 临档: 69-1-12, 1956年1月25日.

<sup>②</sup> 临泉县水利委员会. 1952年农田水利总结报告. 临档: 17-1-60, 1953年2月15日.

<sup>③</sup> 临泉县水利科. 农田水利工作简报. 临档: 69-1-10, 1955年2月28日.

<sup>④</sup> 临泉县委. 临泉县春修工作总结报告. 临档: 17-1-182, 1956年6月10日.

查涉及的2145眼井,水深6尺至7尺的328眼,8尺至10尺的674眼,11尺至12尺的966眼,13尺以上的177眼,最深的也只有15尺,<sup>①</sup>远低于21尺的标准。

尽管质量难以达到要求,但短训产生的技术人员却可以帮助县里在数量上完成任务。由此来看,技术匮乏应该不是基层最头疼的。与技工缺乏可以通过短训缓解不同,打井的经济负担则很难突击解决,而经济障碍的存在,会直接导致打井任务在数量上也难以完成。与土井简单开挖只需劳力投入不同,砖井开挖一个必不可少的原料——砖,就是笔不小负担。按照县政府1955年的估算,打一眼砖井共需材料费150元,包括青砖112元,木盘8元,毛竹9元,棕5.5元,铅丝、细绳、洋钉等15.5元。这还不包括打井工具的购买费,以及打井人员工资等其他杂费开支。此外,砖井的使用与维护同样所费不赀,仅提水必备的马拉车就要180元。<sup>②</sup>合计起来,一眼砖井从开挖到能正常使用至少需330元的投入,而在动辄上万眼的任务下,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1956年,专署分配临泉20080眼的打井任务,按往年成本计算,共需款8610万元,不过专署拨付的水利贷款却只有27万,差额只能县里解决。<sup>③</sup>为了完成任务,临泉决定以群众集资兑料来解决资金缺口。具体做法是将专区分配的打井任务层层分解,这样就顺势将打井的经济负担也转移到基层(主要是合作社)。位居权力底层的基层干部们,既无力抵制上级分配的任务,又不愿因打井增加额外负担,于是便不断向上索要打井资金。迎仙区友谊社主任任月英就曾一天三跑乡政府,要求通过贷款解决资金问题。为了贷到款,任甚至用略带威胁的语气说,“政府不贷款,累死也不成。”但由于集资兑料已是既定方针,任的威胁自然不会有效果。不仅没贷到款,任还被乡干们上了一课,学习了自办和收益互利政策。贷款指不上后,任唯有以集资兑料法来筹集资金。但尽管如此,为了减轻社里的经济负担,任还是想了个“五代替”法,用不花钱买的东西代替打井材料。“用洋布代替帆布,用榨油圈代替铁圈,用牛驴狗皮代替雨衣,用柴绳合起来牲口套代替拉车绳,用电灯代替汽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变通之法受到了县里表扬。<sup>④</sup>应该说,县里对任的认可凸显了其在面对打井资金短缺时的无奈。在县里看来,只要有利于打井任务的完成,用什么方法已不重要。但这样的做法虽有助任

务完成,井的质量恐就难以保证了。

任的替代做法尽管无法保障打井质量,但在政治任务面前,这样的选择无可非议。事实上,以集资兑料的方式解决打井资金,是遍行全县的做法。有的地方为了完成集砖任务,不惜扒坟墓、拆砖桥。1956年,在全县区乡干部会议上,黄岭区提出全区每人集42块砖的任务。在被县委书记指出任务过大后,调整为20块。即便如此,仍难以完成,结果出现不少强迫现象,以致全区私扒坟墓30个,砖门5个,砖桥3个。<sup>④</sup>

打井带给基层的沉重负担,既与规模有关,也与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难以结合地方实际有关。任务与实际需求的不符,在1955年的打井高潮中表现尤其明显。1955年8月召开的阜阳专区水利会议上,临泉分了75眼的砖井任务。据此,县里很快制定了冬春砖井工程计划,将75眼井继续向下分。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县里确定了“以先合作化乡,水利重点乡或国营农场,大社为对象”的任务分解原则。<sup>⑤</sup>但是被忽略的是,合作化乡、水利重点乡和大社不一定是需砖井的地方,很显然,县里的考虑仅是任务完成的便利程度。在此原则下,75眼井被分给了王圩区田桥乡15眼、王圩乡10眼;邢塘区郭营乡25眼;杨桥区延西乡20眼;城关区吴庄圩乡5眼。<sup>⑥</sup>

在确定将15眼砖井任务分配田桥后,县里曾专门作了调查,结果发现砖井在当地作用不大。“田桥乡以前打的砖井共3眼,在往年与1955年起的效益不大,只是双黄庄在1955年旱期间浇了四亩马铃薯,其他未用过一次。”调查中田桥人更是反映,打砖井不如修闸。“程部长与全乡社干群众一致说,根据这个地区东有蝎子沟,西有箭竿河,不如把打15眼井的经费用在东西两条河上,建设两个闸,买两部抽水机,起的效益大。这里有条件建闸,蓄水灌田,何必打这样多的井呢?未免这样做法是有些浪费国家的经济,同时根据这个地区发展

① 临泉县委. 关于农田水利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 临档: 3-1-120, 1956年3月25日.

② 临泉县政府. 砖井经费统计表. 临档: 17-1-157, 1955年.

③ 临泉县委. 临泉县春修工作总结报告. 临档: 17-1-182, 1956年6月10日.

④ 临泉县监察室、水利局. 关于联合对黄岭区史寨乡春季打井情况的检查报告. 临档: 69-2-15, 1956年4月28日.

⑤ 临泉县水利局. 根据专区农水会议布置和徐政委指示目前需要做好的几项工作初步打算. 临档: 69-1-10, 1955年.

⑥ 临泉县政府. 临泉县今冬明春砖井工程计划. 临档: 17-1-157, 1955.

也不合适。要在两条河里修上闸,可浇河岸地五千多亩,占全乡地二分之一以上,每年保证不会受旱,肯定丰收。全乡地 9820 亩,修闸不仅有利于田桥乡,而且利于李老庄区。”<sup>①</sup>尽管在田桥人看来修闸的效益远大于打井,调查组也承认砖井在当地作用不大,但为完成任务,底层的呼声并未改变县委的初衷。1955 年 10 月 23 日的冬春兴修计划显示,王圩区的砖井任务仍是 25 眼,包括了并不适合打在田桥的 15 眼。<sup>②</sup>县委在田桥打井的执着,昭示了在逐渐迈向运动化的打井实践中,完成任务远比现实需要更迫切。

### 三、水井的高报废率与打井运动的效果

作为政治任务分配下来的水井,因无法满足乡

村社会的现实需要,难以起到应有的抗旱作用。1955 年水利科开会讨论各区打井情况时,老集代表在强调本区打井不利条件时指出,“原井不起作用,群众对井没信心。”<sup>③</sup>1956 年县水利局也发现,不少人将打井视为劳民伤财之举,“打的井不起作用,成为劳民伤财。”<sup>④</sup>政治推动下的打井因难以结合地方实际,无法发挥应有抗旱作用,终致牢骚不断。在 1957 年县委召开的农田水利扩大会议上,许多干部认为,“打井是浪费(浪费劳力、土地、费钱)是劳民伤财,除了埋牲口、埋死几个人,一点作用也不起,净是胡×弄,天不下雨光指打井吃饭连×门也没有。”“打井坏的多好的少。”<sup>⑤</sup>基层对打井的质疑,虽有他们因负担过重不愿打井的现实考虑,但更多还是觉得打井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实际上,在资金和技术条件均有限的情况下,被推向政治运动的打井,确实难如预期。这从水井的高报

表 1 临泉县 1950—1959 打井情况统计表

单位:眼

时间	土井		砖井	
	挖新	修旧	挖新	修旧
1949				
1950				
1951	80994			
1952	77895	22445		49
1953	30			
1954	376(砖、土未区分)	157(砖、土未区分)		
1955	9410	1520		75(未分新旧)
1956			18120	
1957	52790		2000	1200 个(未区分砖井与土井)
1958	截至 1958 年底,全县共有土井 45000 眼。		截至 1958 年底,全县共有砖井 16292 眼,其中合乎标准的 13500 眼。	
1959	全县共有合乎标准的井 28000 眼			

资料来源:临泉县河网化指挥部:《临泉县 58 年冬至 59 年春水利工作总结》(1959 年 6 月 6 日),临档:69-2-46;临泉县水利局:《临泉县 1958—1962 年水网化轮廓规划》(1958 年 2 月 6 日),临档:69-1-23;临泉县水利局:《1952—1956 年度临泉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统计表》(1957 年 3 月 13 日),临档:60-1-12;宋思科:《临泉县各区已作抗旱水井统计表》(1954 年 12 月 6 日),临档:69-1-7。

注:县委在统计砖井数目时不仅将全砖井统计在内,同时一般也将半砖井、竹井、条井、苇井、利楂井等也算在砖井之列,故此处也未作区分。

① 临泉县水利局. 田桥乡调查情况报告. 临档:69-1-10,1955 年 8 月.

② 临档县政府. 1955 年冬至明春兴修水利计划表. 临档:17-1-157,1955 年 10 月 23 日.

③ 临泉县水利局水利科. 会议记录. 临档:69-1-9,1955.

④ 临泉县水利局. 临泉县 1956 年农田水利定期统计报表填表说明. 临档:69-1-15,1956 年 9 月 30 日.

⑤ 临泉县委. 关于农田水利扩大会议总结. 临档:3-1-133,1957 年 11 月 11 日.

废率中可见一斑。

临泉县水利局1957年的一份电话记录显示,新打水井的报废率很高。“长官区1574眼井,能修的325眼,不能修的63眼。化集1299眼,能修的457眼,不能修的264眼。老集1461眼,能修的775眼,不能修的683眼。宋集共有1344眼井,可修能用的626眼,不可修718眼。”<sup>①</sup>四区情况可以看成是临泉打井运动现实效果的缩影。在近十年的打井运动中,临泉的打井规模并不算小,但最终保存下来的水井却相当有限。这可以从表1看得出来。

从表1的统计可见,尽管受到经济与技术限制,临泉还是从1955年开始大规模挖砖井,1956年新挖井数甚至高达18120眼。开挖砖井的同时,县里也将原本已终止的土井工程重新上马,1957年就挖了52790眼,数量虽比不上1951、1952年的高潮期,但也相当可观。不过政治推动下的打井工程,其最终的抗旱效果,恐难如推动者所愿。尽管上表个别年份的数据有缺失,但粗略计算亦可发现,自1951年到1957年全县新挖土井至少在177739眼,这还不包括1954年无法区分为砖井与土井的376眼。而到1958年,全县土井仅存45000眼,只占到了历年开挖总数的25%。这说明,临泉历年所开挖的土井多数未能保存下来,当然,考虑到土井的简陋,维护起来可能会相对困难,但投资巨大的砖井同样存在这一问题。1949年到1957年,临泉累计打砖井至少在20195眼以上(不包括未区分者)。至1958年,余下的只有16292眼,合乎标准的13500眼,保存率仅为67%,近三分之一报废。到了1959年,全县砖土井共计合乎标准的也仅有28000眼,一年间又报废了54%。如此的高报废率,已很难指望其在旱灾中发挥作用。1959年临泉又遭大旱,“地干裂,禾枯,秋无收”,这就说明前几年的打井运动并未给旱灾的缓解带来太大帮助。<sup>[9]68</sup>

#### 四、结语

20世纪50年代皖西北打井运动的兴起,旱灾防治是首要目标。但在具体推动中,原定的目标却在步步偏离。频发的旱灾是政府推动打井的初始动力,1954年开始的稻改也使打井规模不断扩大,但打井规模的急剧扩大却带来了技术与资金双重匮乏的难题。尽管短期培训解决了技术短缺的燃

眉之急,但资金缺乏却终使原本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打井踏上了政治运动的轨道。

为了解决打井的资金问题,基层政府只能以集资兑料的方式将负担转嫁到乡村。这样的转嫁看似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使乡村的打井实践变得更为艰难。因为技术短缺本就影响了打井质量,使其在乡村不被看好,而凭空增添的负担则进一步加重了乡村对打井工程的疑虑。“群众纷纷反映砖井本钱太大,受益小,以后怕还不起贷款,不愿意打井,打在谁地里谁就不愿意。”<sup>②</sup>面对来自基层的质疑,推动者的做法不是因地制宜转变打井思路,而是想当然地将质疑认定为民众有思想认识问题,力图以政治批判来解决。1957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就强调乡村对水利兴修的抵制以及一味依赖国家投资的思想,是一种需要批判的右倾保守思想。<sup>[8]</sup>经过这样的政治批判,来自底层的质疑声或会隐匿,表面上可以保障打井运动的开展,但却无法让水井在乡村真正生根,高报废率即是明证。

以政治批判推动打井的做法,也使打井蜕变为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工程,与乡村现实需要的脱节就难以避免。1953年临泉县水利委员会就指出,打井“缺少全盘计划,只是上传下达,一般号召,比猫画虎,逐级布置任务,满足数字成绩,带有极大盲目性。什么地方负责挖沟,什么地方负责打井,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行动是盲目的,不符合实际的。”<sup>③</sup>而不考虑现实需要的打井,也就不可能在干旱时发挥应有作用,水井的失效反过来又影响到民众的打井积极性。于是,一个恶性循环便由此而生。走向政治运动的打井难以照顾地方实际,无力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在缺乏底层支持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推广打井,又只能进一步强化它的政治属性。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每一年的打井数字目标虽然完成了,但高报废率却说明政治推进的打井已和原初的目标渐行渐远,政治化最终消解了这场打井运动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农业部农村水利司.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M].北京:

① 临泉县水利局.电话记录簿.临档:69-2-33,1957年2月1日.

② 赵荣秋.赵县长报告.临档:66-1-13,1952年12月26日.

③ 临泉县水利委员会.临泉县1952年一年来农田水利工作总结报告.临档:17-1-60,1953年1月26日.

-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9.
- [3]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水利 50 年 [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 [4]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阜阳地区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6.
- [5]李景汉.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安徽省志·水利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 [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1952-02-13(1).
- [8]于明, 于风. 淮北地区能达到农业纲要产量指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淮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N]. 人民日报, 1957-11-12(2).
- [9]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临泉县志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责任编辑: 李良木)

## Well-Sinking and Politics: A Well-Sinking Drive in the Mid-1950s

GE 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Guangdo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d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farm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t the dawn of the Republic, highlighting the well-sinking drive in the Northwestern Anhui Provinc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ization was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proposal, decision, technology use and economic restriction of the drive. The political-movement-oriented digging fever was not brought down by the grass-root units' doubts and complaint provoked especially by the high spoilage. The accelerating politicalization and rate of rejection had finally nullified the orig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Key words:** Northwestern Anhui Province; Well-sinking; Irrig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Political Movement